“三峡工程”牵动着
千千万万个炎黄儿女的心

☆毛泽东诗画蓝图
☆周恩来感到“如履薄冰”
☆邓小平:我赞成搞低坝方案
☆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先后投了赞成票
☆“百家争鸣”与“一家独鸣”
☆江总书记与泽被人民的三峡工程

从1953年提出动议,至1992年初国务院通过可行性报告,新中国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已经进行了39年,几乎跟它自身的历史一样长!

39年,这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个空前的纪录,在世界大坝建筑史上,亦属罕见。

这场旷日持久、众说纷坛的论证,已震动朝野举世瞩目。

其过程犹如三峡本身,重峦叠嶂,九曲回肠。其深远意义,已经超出了三峡工程本身的范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孙中山第一个做起“三峡梦”

如追溯历史，最早设想在三峡造坝建库的，是孙中山。

“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上,而又可资其水力。”这就是这位民主革命先驱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一文中的设想。此文写于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际。

1924年8月17日，已成为“国父”的孙中山应邀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对三峡设想更为明确：

“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从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 3000 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新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化肥。”

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朦胧的梦，却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

第一批到三峡实地勘测水力发电的，是工程师恽震等 5 人，时间是在 1932 年 10—11 月。这支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扬子江水道委员会赞助的“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察队”,器材简陋,经费短缺，人员不足，资料奇缺。在宜昌凭几页短期流量记录，绘制成了中国第一张“宜昌扬子江流量曲线图”。又租船上溯重庆，对宜渝间河段作全线察看，并在黄陵庙一带进行测量和选择坝址，于 1933 年 3 月拟出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察报告”,这是中国第一份三峡工程“论证报告”，是企图把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张粗陋而珍贵的蓝图。

但当工程师们在长江上奔忙,做着修建三峡电厂的梦时,蒋介石正忙着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做着消灭红军、消灭共产党的梦。这两个梦是无法重合的……

萨凡奇梦得如痴如醉

不仅是国人，而且洋人也做过三峡梦。美国人萨凡奇是其中最痴情的一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凡奇提出要在美国西北部哥伦比亚河上修建大古力水坝，发电量 197 万千瓦，投资预算为 3 亿美元。1938 年，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在芝加哥集会，同声斥责萨凡奇，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到那个不毛之地建坝？是不是疯了？可是罗斯福总统支持了萨凡奇的建议，大古力水坝以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建成了，大战期间，大古力为美国战时生产提供了大量电力，而且给整个西北部带来了繁荣。从此萨凡奇成了美国工程界不可动摇的权威。

1944 年 5月，当萨凡奇应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聘请来到中国时，他是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已经设计建造了 60 座大大小小的水坝，包括当时世界上四座最大的大坝中的两座——美国的鲍尔德水坝和大古力水坝，因而已成为誉满全球的坝工专家。

当时，宜昌已被日军占领，日本飞机还常在峡江中巡逻轰炸。但年过花甲的萨凡奇执拗地表示：生死不计，定要前往。他甚至向他的学生——中国工程师徐怀云安排了遗嘱。

1944 年 9 月，资源委员会包租的民康轮载着萨凡奇一行，从四川万寿出发，抵达西陵峡中的平善坝。萨凡奇弃船登岸翻山越岭,以 10 天时间踏勘了三峡的山川形势。返回长寿，萨凡奇在中国技术人员的协助下,辛苦了 40 昼夜,完成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报告包括水库、拦河大坝、电厂、厂房、船闸等 16 个部分，洋洋数十万字。

在将报告递送资源委员会的同时，萨凡奇致信委员会主任翁文灏："扬子江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实是我从事工程 40 年以来之一大快事。我研究此项计划至为欣幸。"

1946 年 3 月，萨凡奇再次来中国，去南津关一带登山涉水，用 9 天时间察看了全部坝址。这位一生中走遍世界不少大江大河的坝工专家，在记者招待会上热情洋溢，侃侃而谈：长江三峡的自然条件，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不会有第二个。上帝给你们中国人赐福。我已经 65 岁啦，三峡计划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如果上帝给我时间，让我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么我死后的灵魂会在三峡上得到安息！

按中国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的合约：美国马力森公司承包了坝址地质钻探，费其艾公司承包了库区航测摄影。1946 年 9 月,中方工程人员 46 人由徐怀云工程师任领队到达美国丹佛，参加三峡工程的联合设计工作……三峡梦，似乎真的看到一线希望了，但事实是多么冷酷。1947 年 5 月，一纸命令，召回了全部工程人员，一个疯狂打内战的政府怎么会把钱花在造大坝上？三峡工程成了萨凡奇一个失落的梦。到 1963 年，84 岁高龄的他还念念不忘地对前去看望他的徐怀云说："中国大坝是一定会建起来的。你们中国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撂着不用。"

长江给新中国领导人上的第一课

1949 年夏天，全国解放在即。但当解放大军挥师南下经过湖北、湖南时，迎接他们的却是长江大洪水。这是相当于 1931 年的大水——1931 年长江洪水淹死了 14.5 万人！

仓促到任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立即奔赴长江最

危险的荆江河段抗洪抢险。当时南岸已一片汪洋，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北岸的荆江大堤,已开始局部崩塌,岌岌可危,险情万状！

万幸的是洪水也恰好在此时开始降落，荆江大堤奇迹般地避免了溃决改道。在大堤后面，是比江水低 10 多米的江汉大平原，万一大堤溃决，洪水一泻千里。死亡人口将比 1931 年还要多好几倍，后果不堪设想！

这就是长江，给即将登台的新中国领导人上的第一课。于是刚建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把战略重点放在研究长江防洪上。1950 年 2 月“长委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1950 年国庆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详细询问了工程情况，看了设计书，并问工程寿命多长？“当回答说至少可以用 30 年时，毛主席说‘20 年够了。”

当时，年仅一周岁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资金、材料和技术严重缺乏，真正是“一穷二白”。而荆江分洪工程是在软地基上兴建的一座长达 1054 米的大闸，在建国之初要建成并能安全运用这样大规模的工程，确非易事。工程于 1952 年初春开工，集中各方面力量,仅用 75 天时间便全部竣工。这是万里长江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闸。

1954 年，长江发生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洪水，荆江分洪工程 3 次开闸分洪，使荆江大堤得以安全渡汛，保住了武汉的主要市区，几十万生灵免于涂炭。

但对长江防洪来说，荆江分洪 54 亿立方米洪水只能对洪灾起到缓解的作用。长江、汉口堤防 64 处溃口，仅湖北境内受灾农田就达 2127 万亩,受灾人口 926 万人,死亡 3 万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 100 天,残堤上庵棚密布,灾民人畜混住,缺衣少食，病疫流行，苦不堪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是更为惊心动魄的一课！

必须从根本上治理长江洪水！而荆江分洪工程，在当时只能算一项应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毛泽东说“20 年够了”,看来在他心目中,20 年内会有重大治本工程完成。

第一次出现了“不”的声音

1953 年 2 月 19 日,“长江”舰从武汉启航,顺流而下,在二楼卧舱里住着新中国的国家主席毛泽东。

三天三夜的随行，两天两夜的谈话，成了林一山此生最难忘怀的一页。在他看来，“一代伟人所规划的，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工程的轮廓,在‘长江’舰上,初步形成了。”

但也有人,并不这么看问题。不过这个“不”的声音,要在三年以后才出现。

1954 年底，在京汉线上毛泽东的专列里，林一山又用整整一夜时间，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

1956 年，长委会在三峡工程的勘测和科研方面取得了肯定成果并报告了毛泽东。7 月，毛泽东到达武汉，畅游了长江，写下了石破天惊的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位六亿中国人的领袖,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了新中国修建三峡大坝的蓝图与决心。

“不”的声音紧接着出现了,1956 年 9 月,在《水力发电》杂志上刊登了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的长文，作者是中国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当年仅有 30 多岁。

当然，这篇文章不是针对毛泽东的，而是针对林一山同年发表在《中国水利》'5—6 期上的《关于长江流域若干问题的商讨》。

两万多字的《商讨》一文中强调: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三峡工程可以改善川江航道，使万吨巨轮终年通航于城陵矶与重庆之间；发电方面可以装机 2300 千瓦,每年发电 1500 亿度（以上均以蓄水位 235 米计）。

也是 2 万字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绝对化了；强调如果要建 235 米高程的三峡大水库,将迁移人口 215 万,淹地 120 万，即使只从淹没损失来考虑，这样的方案就极值得怀疑；提出先修支流水库、后修干流水库、逐步提高长江防洪标准的设想，最后，文章分析了三峡工程的兴建，“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尚未经历过的技术问题”，我国的经验和技术条件是不成熟的。

周恩来站在荆江大堤上感到“如履薄冰”

1958 年 2 月 28 日。荆江大堤。铁牛湾。

漫天飞雪，江风似刀。

一大队迄逦的人群，顶风冒雪，蹒跚而行。

为首的那个身穿深色长大衣的，正是周恩来，跟他边走边谈的，是林一山。在他们身后，是一大群中外水利专家，部长、省长,包括两位副总理 李富春,李先念。

周恩来走着走着，停了下来，默默地注视着荒凉的江滩。江滩上立着一头锈迹斑斑的大铁牛。

这是咸丰皇帝赐来制镇洪水的，已在这里挺立了 125 年。此地，是历史上两次大决口的旧地。

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绵延 182 公里的荆江大堤，保护着江汉平原 800万人民、1000 多万亩农田、以及武汉、沙市等重

要城市。《江陵县志》称:“江陵以堤为命。”《荆州万城堤志(万城堤为荆江大堤的旧称)》强调:“湖北政治之要莫如江防,而江防之要尤在万城一堤。”

历史记载:从 1849 年至 1949 年的 100 年间,长江发生过七次大洪水,平均 14 年一次!

其中:1860 年、1870 年两次特大洪水,荆江大堤决口,造成 30 多个县被大水漫浸,田亩淹没,房屋无存。几百万人被洪水夺去了生命,还有数千万人在大水中绝望地挣扎哀号。一场可怕的恶梦,笼罩了半个中国!

1931 年大洪水,中下游淹地 5090 万亩,人口死亡 14.5 万人,汉口被淹了一个月,市内陆地引船,京汉铁路被冲毁。

1935 年大洪水,一夜之间,汉江中下游淹死 8 万人,澧水中下游淹死 3 万多人……

林一山告诉周恩来,这里的长江洪水位,能高出地面 10 多米,站在沙市楼房上看长江,轮船像是从屋顶上驶过一般。荆江大堤在洪水季节万一决口,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周恩来边听边点头,浓眉紧整:“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仍然存在,荆江大堤要加固加高。”

大队人马继续乘“江峡”轮溯江而上,边查勘三峡边讨论三峡工程。李锐日后回忆道:“这时大跃进的高潮正在开始,于是三峡上马的呼声复起,真是压过了峡谷中的涛声……在船上开会时,总理让我第一个发言,我仍然‘舌战群儒’,大唱反调。”

3 月 6 日到了重庆,周恩来对 9 天的查勘讨论作了总结发言:“大家一致肯定了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搞,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在不太长的时间,16

年到 20 年，就可以建成。取得这样一致的意见，大家都愿做促进派,这是很大的成功。”

两年来的争论也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

无形的手

1958 年 3 月下旬，党中央在成都开会，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率队查勘三峡后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自1953年提出动议以来，中共中央对三峡工程所作出的第一个正式决议,所下发的第一个“红头文件”。

27 年后,李锐在《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序’中,引用自己的一篇回忆文章,这样评价成都会议与《意见》；

“这次会议为大跃进通过了许多决议，唯独有关三峡的决议没有什么大跃进的味道。”

“回头来看,1958 年初正是吹响大跃进进军号请之时，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比较切实的决议,20 多年之后仍然可以作为长江规划的指导方针,这自然是由于总理亲自抓了这件大事。”

有了《意见》这支‘令箭’,‘三峡热’迅速上升为‘三峡旋风’。

多么奇怪,与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不要科学的年代相悖的是‘三峡旋风’一切围绕着科研展开。

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牵头，成立了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全国先后有 200 多个单位的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这一科研大协作。

两年之中，连续召开了两次大型的三峡科研大会，一批著名

的科学家被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旋风”:华罗庚、周培源、张文佑、田鸿宾、朱物华、张如屏、钱令希、张光斗……

两年多时间里,经过反复证论,多方案比较与科研攻关,三峡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有了实质性的推进……

正在林一山为实现“三峡梦”飞速旋转时,他的对手李锐正在走向厄运。

1959 年 8 月,在庐山会议上,由于与周小舟的事有牵连,李锐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一篇杂文“大鱼网主义”,不点名地批评了急于上三峡工程的人是“喜欢办大事情,热衷于解决大问题,急于一次彻底解决问题”;此刻理所当然地成了“反对毛主席”的“反党言论”。

1960 年 4 月,在广州协作区会议上,讨论了在“二五”期间列 4 亿元投资,并准备 1961 年三峡工程开工。

林一山现在大概可以松一口气了:三峡工程的反对者李锐,已经被下放到一个水电工地当教员,没有力量再反对了,三峡工程的动工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当时,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想到——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向三峡工程逼近,这只无形的手比李锐的“不”的声音,要强大无数倍。

仅仅过了四个月,即 1960 年 8 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亲自调整了三峡建设步伐,同时,又强调“雄心不变,加强科研。”

此时,国际国内风云变幻。国际上,中共与苏共的矛盾公开化、表面化;“苏联老大哥”已撕破了脸皮,撤回专家,催逼还债;中国也不示弱,以《九论》来回敬“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在国内,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已露端倪,大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

1960 年 9 月,原定召开的三峡第三次科研大会改成分组开

小会,制定‘1961 年——1962 年两年科研计划’。

1961 年下半年，不仅原定的“开工”落空，而且由于长办机关（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已改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大办农业”,三峡设计人员从上千削减到了仅剩 40 人。

1962 年 12 月，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又把‘1961 年——1962 年两年科研计划’调整为“1963 年——1972 年十年科研规划”。‘三峡旋风’烟消云散，‘开工’的希望变得虚无飘渺。

焦虑、惆怅，林一山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

“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当周恩来在这个口号下,一次又一次“调整三峡工程建设步伐”时，不知他又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不久前是他，指示林一山创办长江工程大学，为三峡工程培养大批人才；也是他,亲自安排拨给林一山 3000 名铁道兵，成立长办施工总队！

真正‘扼杀’了三峡工程的,是那只‘无形的手’。有益的争论只会使真理越辩越明，使论证逐步深入，反过来说，假如当初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都有顽强的“不”的声音，而各级领导者又都能像‘江峡’轮上的周恩来,提倡鼓励不同意见的争论,那么，这只‘无形的手’后来也许不至于能那样猖獗,而三峡工程,也就不至于一直‘论证’到今天了。

1966 年，当文化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每一寸神州大地时，林一山被关进了长办的地下室，他只能在这不见天日、水没脚背的‘水牢’里去做他那破碎的‘三峡梦’了。

荒诞与科学

1969 年 9 月，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向毛主席提出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峡工程,毛主席指示“: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并反问不识事务的张体学“:脑壳上顶 200 亿方水,你怕不怕 ?”

更加‘ 不识事务 ’的是林一山,他被‘ 解放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对建葛洲坝工程。

葛洲坝位于西陵峡出口处，距三峡工程的坝址三斗坪 40 公里。原设计中它是三峡大水库的反调节水库，要在三峡工程的后期才兴建，现在反客为主，反后为先，仓促上马。

复杂、巨大的工程,又处在主航道上,地质情况不清楚。甚至还没有一张总体设计图纸，工地上的爆破声已经响开了。

原先有经验的专业施工队伍被解散，上万新战士唱着语录歌开上工地“,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 ”与‘ 万人设计,万人审查 ”的口号声震天响。

开工后才发现，葛洲坝下面地质条件不好，有 70 多层的泥化夹层,在这种‘ 千层饼 ”上浇筑大坝,是致命的隐患。更要命的是 按操作规程,在浇灌混凝土时必须加冰搅拌,以降温防裂,而指挥部竟命令‘ 不准给混凝土吃冰棍 ”,称这是‘ 资产阶级的陈规旧律 ”,甚至宣布“:谁再吃 ‘ 冰棍 ’ ,我抓他坐牢 !”

问题马上暴露出来：施工没有规划，主航道造成交通阻塞，交通部火急向国务院‘ 告状 ”砸烂了‘ 陈规旧律 ”,混凝土到处是“ 蜂窝 ”,甚至‘ 狗洞 ”,坝身出现了 86 条裂缝……

“ 工程必须停下来 ”,——这是周恩来的决定。 1972 年 11 月，周恩来已经确诊得了癌症，仍然自始至终主持了国务院召开的葛洲坝工程汇报会。

“ 建国二十几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要载入史册的 !”周恩来痛心疾首,沉重的心情使他显得分外苍老与憔悴。

“ 林一山,你原先主张修大的,你把那个大坝说得太容易,我

们不要太自信了。我们说服你，先修葛洲坝作试验。这里出现的问题，在三峡同样会出现。搞好了葛洲坝，林一山同志，就是大成功。”

林一山的心里流着苦涩的泪。但他二话不说，接受了周恩来的安排：立即着手组建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

林一山受命于危难之际，技委会身负扭转乾坤之重任！

根据技委会的决定，长办结束了“斗批改”时期被分割的局面，上下一心，全力投入了工程设计。

技委会反复审议设计结果，一个个复杂而艰难的技术问题，终于逐个得到了解决。

1974 年 10 月，在停 122 个月之后，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终于正式复工了。

以后发生的事，业已众所周知：

1981 年 1 月，长江截流成功。

同年 7 月，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1988 年底，16 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至 1991 年 12 月发电总量已达 1077 亿千瓦时，创利税 40 亿元，仅此一项已与葛洲坝工程总投资 48.48 亿相近。

四川省委书记态度微妙

1978 年 6 月下旬，林一山带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川东地区调查研究三峡库区的移民工程。 23 日到达成都，会见了四川省委书记。

他希望三峡工程能得到这位省委书记的支持。

书记的回答是含蓄的：四川不是不想搞三峡工程，而是想晚一点搞。这几年川东人民被“四人帮”搞得很苦，想缓一口气。

他认为,搞移民工程,因地制宜,就地后靠,搞多种经营是好的,但四川山多,在山上粮食问题不大好解决。当林一山解释工程和移民都可以分期分批进行时,书记表示三峡分期搞,移民 20 万左右,问题不大,可以考虑。但希望在四川其他水库先搞一个试验。

四川省委书记的微妙态度可以理解。三峡库区长 660 公里,其中有 85% 的移民和淹没土地,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而将来三峡发电、航运和防洪的好处,主要在中下游。

当年美国的胡佛大坝争执不下,就因为上下游各州的利益分配不均。先为用水的多少争论了 20 年,接着又为售电的权益吵闹了 8 年,直到分别签订了分水与售电协议,大坝才在 1931 年得以动工。

七国八方的利益总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美国有,中国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那么超脱。

四川省委书记的微妙态度引起了“主上派”的深思,一定要解决好移民的出路问题,否则,三峡难上。

1984:箭在弦上

从重庆顺江东下,越过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便进入滩多水急的西陵峡,当江轮驶过著名的险滩——青滩之后,江面豁然开阔,迎面展现出一座翠竹丛生的小岛——中堡岛。

中堡岛,是长达 192 公里的三峡中唯一的岛屿,设计中的三峡大坝坝轴线,就从这座小岛上横贯而过!

三十多年来,这座神奇的小岛吸引了中外数以千计的水利专家,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

几乎都来这里视察过。

1980 年 7 月，它又一次引来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邓小平。

75 岁的邓小平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视着这座船形的小岛，他对三峡工程的兴趣不亚于当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建设三峡效益很大，尤其是对防洪——他这样认为。到达武汉后，他召集赵紫阳、姚依林、宋平三人到武汉研究三峡问题。

两年之后，国家计委向他汇报关于 20 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计划，其中谈到准备兴建三峡工程，邓小平又一次表态：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而此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看问题的角度已跟四年前有所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四川时我是不赞成上三峡的，到中央后，感到三峡应该上。

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亦先后投了赞成票。

在这些巨手的推动下，三峡工程的车轮又一次加速运转，并遇到了一路‘绿灯’”。

1983 年 5 月，由国家计委召集有关的国务院 16 个部委、鄂湘川 3 省、58 个科研施工单位及 11 个大专院校的专家、领导，共 350 多人，审查通过了长办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 150 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4 年 2 月，国务院总理和万里等出席的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批准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 150 米、坝顶高程 175 米的方案，并决定立即开始施工准备，争取 1986 年正式开工。4 月 5 日，国务院以(84)国函字第 57 号文原则批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9月，首批施工队伍进入三峡坝区开始“三通一平”等三峡

大坝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此时此刻，三峡工程已是“箭在弦上”——

站出一批情绪激动的老先生

1985 年 3 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长办的政协委员曹乐安正在房里跟人讨论三峡工程，一位来串门的委员感到惊讶：三峡不是不可行吗？怎么还要讨论？他拿来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 721 期,上面登着李锐的文章《再谈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李锐复出后,任电力部副部长)。

后来才知道,好多人手上都有这份《清样》。

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92 岁的孙越崎耳聪目明,思路清晰,绵长的声音里带春浓重的绍兴口音:“中央已经决定上马了，本来不应再提反对意见，但我心里放不下，不要鸦雀无声么！……我要做到一谏不成,再谏不讳,劳而无怨。”

孙越崎,民国初年北洋大学矿冶系学生,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开除，后留洋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后又辗转欧洲考察各国矿冶工业。回国后于 1940 年，出任甘肃油矿总经理，在纷飞的战火中、在荒摸的戈壁滩上，仅用两年时间建起了一座石油城,以大量的国产汽油、柴油、煤油支持了西北的抗日战争。这是我国自己建起的的第一座油矿——玉门油矿,为此,孙越崎获得了中国工程师学会的金质奖章，成为享誉西北的“煤油大王”。

1948 年，孙越崎接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次年,又兼任经济部部长,掌管全国国营的煤、电、石油、钢铁、机电制造等重工业生产建设。在 1949 年蒋介石下令退迁台湾时，孙越崎出于超越党派利益的爱国之心，冒着生命危险，拒

绝将资委会所属的一万多个重工业企业迁往台湾，率领 3 万多技术人员和 60 多万员工集体投向共产党，使全部工厂、矿山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在此后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孙老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工业建设 在内蒙,他帮助包钢改用自产炼焦煤,节约了资金 在北京,他经过实地考察,提出京冀联合开发煤矿,建坑口煤气厂,向北京送气……

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然爱国心切的老先生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三峡。会后他不顾年迈,“ 百岁挂帅 ”,带领 9 位平均午龄超过 70 岁的政协委员,奔赴四川,从重庆乘船顺江而下,开展调查活动。

38 天的考察，产生并向中央呈送了调查报告：

《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其理由是：一、三峡工程总投资：不是 200 亿元,而是 600 亿元 二、防洪 不仅解决不了中下游的防洪问题,反而还会加剧上游的洪水灾害 三、泥沙淤积 问题并没有解决 四、航运 弊多利少 五、发电 投资多、工期长、产出慢、效益差 六、移民 需要重建 10 余座城市 七、安全 要冒灾难性的风险。

国务院能收回成命吗？

1985 年 9 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孙越崎等老先生对此“ 再谏不讳 ”。支持他们观点的还有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他呼吁三峡工程的论证，一定要请不同意见的专家参加。除了水利水电专家外，还要请有关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环境专家、系统工程专家及社会人士参加，这样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